

“双减”视域下身体素养培育的政策迭代审思

黄越 谢光辉^{通讯作者} 朱红军

(湖北医药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湖北 十堰 442000)

【摘要】“双减”以促进中小学生全面发展与健康成长为愿景,加强身体素养培育是对“双减”的有力回应。“双减”视域下身体素养培育经历了四次政策迭代,即初期探索(1949-1965):从关注健康到教学压到一起;过度矫正(1966-1977):减负与智育相对立,“减负”走向极端;解放思想(1978-2009):从“应试教育”到“素质教育”;综合治理(2010-至今):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减负”。

【关键词】双减政策;身体素养;家校社协同;政策迭代

身体素养(physical literacy, PL),逐渐成为新时代体育改革与发展的理念^[1]。2019年8月,《体育强国建设纲要》明确将人民身体素养发展,尤其是青少年身体素养发展作为重要的战略目标和任务。身体素养是个体在整个生命历程中获取和理解身体活动与健康促进的信息,并运用这些信息促进身体活动参与以维护健康的综合能力,是个体全面发展的体现。“双减”以中小学生的全面发展为导向,加强综合素养培育是对“双减”的有力回应^[2]。

1 “双减”视域下的政策迭代

1.1 初期探索(1949-1965):从关注健康到教学压到一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尤其是在土改完成之后,一些地方政府教育行政干部忽视教育疏于管理,生成劳动量过大,社团活动过多,学生学习负担太重,加之伙食管理不当,卫生工作不足,学生身体健康受到影响。基于此,毛泽东于1950年、1951年,针对学生健康问题提出“健康第一,学习第二”的教育方针。为切实改善各级学校的学生健康状况,1951年8月《关于改善各级学校学生健康状况的决定》强调保障学生的身体健康,才能使促进学习任务的完成。初期探索的前五年,学校按照“健康第一,学习第二”的教育方针持续推进,在保障学生健康的前提下,国家更多地关注教学。1953年和1954年分别发布了有关改进和发展中、小学教育的指示,明确“教学是学校中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可见,当时学生学业负担过重问题并没有成为教育工作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教学中心任务”仍然是当时教育政策的基调。1955年7月《关于减轻中、小学校学生过重负担的指示》,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减负令”,指出学生的课外作业繁重和考试多是其主要现象,但这种现象“只发生在

部分地区和部分学校”,要求检讨学生负担过重现象,而不能否定提高教育质量工作及成绩。1963年3月,中共中央针对全日制中小学工作强调将提高中小学的教育质量,摆到党和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上。

1.2 过度矫正(1966-1977):减负与智育相对立,“减负”走向极端

1966—1977年,我国教育事业基本处于瘫痪状态,学生负担主要从阶级斗争角度将其进行政治化,导致实际症结认识不清,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未能及时解决,最终淹没在“文化大革命”的湍流之中。196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数次发文规定:一律不进行中小学学期考试,推迟招生工作,学校不放暑假,大中小学全面“停课闹革命”^[3]。课程安排以政治学习为主,并带有浓烈的阶级意识。1968年,毛泽东号召知识青年下乡再教育,很有必要^[3]。为此,全国知青下乡,形成一种固定制度。1970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招生(试点)请示获中共中央批准,招生废除考试,通过“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院校复审”来招生,实行“开门办学”的方针;期间中小学文化课学习时间占比不足60%,学生将更多时间投入在“学农”“学工”“学军”等活动中^[4]。1972年,周恩来在全国计划会议上,强调在科学、教育工作中,把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抓起来。1973年,国家体委在全国推广《第五套广播体操》和《体育锻炼标准》,全国体育教学逐渐恢复起来。1975年,邓小平恢复工作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逐步开展教育工作整改^[5]。在这一环境引导下,已有意把教育工作重心开始转移到办好教育上。

1.3 解放思想(1978-2009):从“应试教育”到“素质教育”

1985年至2009年,我国教育政策与理论界就“减负”问题从教育思想的视角出发进行探究,主要议题

集中在“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的对立。1985年5月，邓小平提出了“劳动者素质”的重要思想。对“盲目追求升学率”进行重新批评，“应试教育”被提出；学生学业负担过重被归因为应试教育，而素质教育成为减轻学生负担的主要思路。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指出：“中小学要切实采取措施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扭转应试的片面教育思想，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新的方向^[4]。2000年1月教育部印发《关于在小学减轻学生过重负担的紧急通知》指出：“学生负担过重阻碍了素质教育的全面实施；对小学开设的课程门数进行了明确的限制并使用经审查通过的教科书。2002年11月，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2007年10月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要求：“减轻中小学生学习课业负担”“减负”工作作为专项改革任务被单独提出。

1.4 综合治理(2010-至今):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减负”

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指出“减轻学生课业负担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政府、学校、家庭、社会需共同努力，标本兼治，综合治理”。自此，我国的学生减负工作进入了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时期。2011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将学生减负工作列入其中，通过教育改革，实现中小学生学习减负的目标。2017年，《国家教育事业发展规划“十三五”规划》和《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切实减轻中小学生学习过重课业负担”。2018年，教育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了《中小学生学习减负措施》(减负三十条)提出“规范学校办学行为”、“严格校外培训机构管理”和“切实减轻违背教育教学规律、有损中小学生学习身心健康的过重课业负担”。2021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这是新时代应对这一问题的最新、最系统、最全面的政策措施^[6]。

2 不同阶段主要问题的审视

2.1 初期探索(1949-1965)

虽然学生学业负担有所减轻，但课程多，压力大，讲授不得法，片面思想等问题日显突出，引起了党和群众关注。毛泽东于1964年在春节座谈会上发表“教育革命”的谈话及回应《群众反映》刊文有关“中小学生学习课业负担重”的问题时认为，“课多，书多，压得太重”，可通过缩短学制，课程砍掉一半来解决；课

程多、讲授不得法、考试举行突击，不利于培养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得到发展。同年5月，教育部发布报告批评“衡量一所学校，看升学率高低”的错误思想。群众的呼声加之毛泽东的批示，使得“减负”开始成为基础教育的一项重要任务。

2.2 过度矫正(1966-1977)

这一时期，“学农”“学工”“学军”活动严重冲击了我国社会主义教育的发展，加剧了学生学业之外的负担。经梳理发现，这一时期的“减负”呈现如下特点：第一，强调阶级路线和阶级斗争，政治化是其主要归因。教育工作被阶级路线和阶级斗争内容所占据，例如：军体课中极具政治色彩的“跳忠字舞”^[5]。第二，对党中央、毛主席“减负”思想中某些内容的理解偏误及过分夸大。例如：学制要缩短，课程可以砍掉一半等指示；“以劳动代替体育”、“以军事代替体育”的政策倾向。第三，减负与智育相对立，“减负”走向极端。当时的环境中，“学农”“学工”“学军”活动占据学生大量课余时间。

2.3 解放思想(1978-2009)

自1978年至1988年，十年间“减负”工作呈现出从择校压力到学业负担过重的特征。其一，1978年1月至2月，教育部对办好重点学校进行明确规定。“层层重点”的格局导致教育结构失衡，集中优势力量办教育，集中优势资源向少部分学校倾斜，学校差距被扩大，学生的择校压力上升。虽然1986年3月国家教委采取“取消初中招生考试，并按学籍管理规定就近直接升入初中学习”予以应对，但学生择校压力依然巨大。其二，片面追求升学率和以“创收”为目的的复习资料泛滥加重了学生的学业负担。1983年12月，教育部颁布了有关“减负”的“十条规定”，提出通过保证学生睡眠和课外体育、文娱活动时间，减少考试次数，在全国不得举办全日制升学补习班等举措来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

2.4 综合治理(2010-至今)

从“双减”出台的背景来看，义务教育阶段短视化、功利性问题日显显著，中小学生学习负担太重问题突出。其一是学生过重的作业负担，缺乏科学合理的作业管理；其二是校外培训井喷式的发展，不同学段教育规律被打破，超前超标培训现象频发；随着社会资本的涉入，收费高，乱收费等违规行为给家长带来了较大的风险隐患。一系列不合理的教育行为致使学生负担过重，家长精神和物质层面的焦虑过重，教育改革发

展成果受到巨大挤压，教育生态失衡，社会反响强烈。

3 “双减”视域下身体素质培育的新思维

3.1 落实“双减”，强化身体素质培育，使学生回归全面发展

人人平等、自由而全方位的发展，既包括智力与体力的协同发展，也涵盖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观的阐释。教育评价导向的偏离及我国中小学生近视、肥胖、心理、体质下降等健康问题严重影响了学生的全面发展。“双减”政策将释放出的时间和精力还给学生，聚焦身体素质的综合育人功能，身体素质贯穿整个生命历程，真正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推动“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践行“立德树人”根本目标。

3.2 落实“双减”，重构身体素质内容，使教育回归学校

全面提高与优化学校教学质量是学生减负的根本之策，突出学校教书育人的主体地位，合理布局教学内容，优化教学手段，极大可能满足学生的需求，让学生在“吃饱吃好”，才能降低家长的教育焦虑情绪，客观看待校外培训现象。“双减”之下，学校教学模式与方法的革新，是提升课堂教学质量，要向“45分钟”要效率的有力保障^[8]。明晰中小学生学习目标指向：认识指向、实践指向、价值指向；提升课堂教学质量，将身体素质培育内容融入新课标，开展课内外的体育活动，学校提供开展身体素质培育所需的教育优质资源。

3.3 落实“双减”，构建身体素质“家校社”一体化模式，使主体回归协同育人

教育事业的发展涵盖多元主体的协同，包括家庭、学校、社会三者共同协作，助力青少年的成长和发展。由于不科学的评价机制，传统的育儿观念，以盈利为目的的教育培训机构大量涌现，使得“家校社”协同育人功能发生错位。“双减”之下，聚焦“家校社”协同，推进协同育人共同体建设，努力形成“家校社”

减负共识至关重要。重构身体素质“家校社”一体化培育内容框架，以学校体育教学活动，综合性家庭、社区体育活动为主题，整合课后延时服务、体育家庭作业、校际间体育比赛、亲子活动和同伴游戏内容；身体素质导向的体育课程创新与改革活动，打造学校“60 min 体育生活圈”。

参考文献：

- [1] 任海. 身体素质：一个统领当代体育改革与发展的理念 [J]. 体育科学, 2018, 38(03): 3-11.
- [2] 专家组. “双减”政策与学校体育发展 [J].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2021, 45(11): 1-15.
- [3] 何东昌.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纲 [M]. 海南: 海南出版社, 2002.
- [4] 张冰, 程天君. 新中国成立以来学生“减负”历程的回顾与反思 [J]. 教育科学, 2019, 35(06): 33-39.
- [5] 高晓峰. 中国学校体育政策变迁研究 (1904-2014) [D]. 北京体育大学, 2017.
- [6] 项贤明. 七十年来我国两轮“减负”教育改革的历史透视 [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 2019, 37(05): 67-79.
- [7] 丁学东. “双减”落地还需学校给力 [N]. 人民政协报, 2021-08-18.

基金：2022年湖北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 (22D093); 2022年湖北省教育改革发展专项重点课题 (序号 35); 2023年湖北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23Z512); 2023年湖北本科高校省级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2023416) ;

作者简介：

第一作者简介：黄越 (1986-)，男，汉族，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学校体育。

通讯作者简介：谢光辉 (1971-)，男，汉族，学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体育教学。